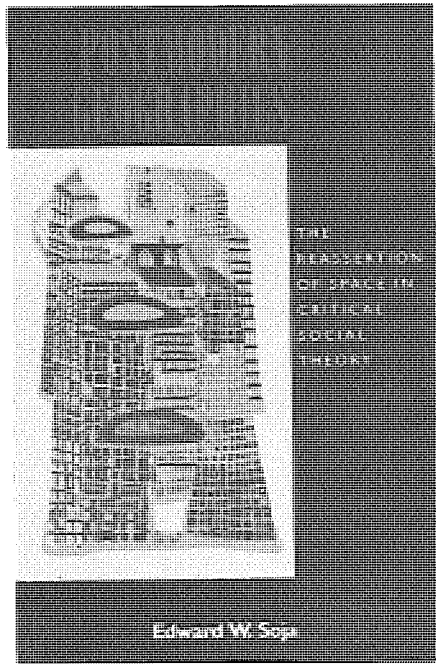


# 重構空間意識： 後現代地理研究

• 唐小兵

空間化歷史重構，無疑會進一步釋放出歷史經驗的複雜性和偶發性，在打破任何企望凌駕一切、統帥一切的元敘述的同時，凸現出被掩蓋、被遺忘和被壓抑的分敘述或微觀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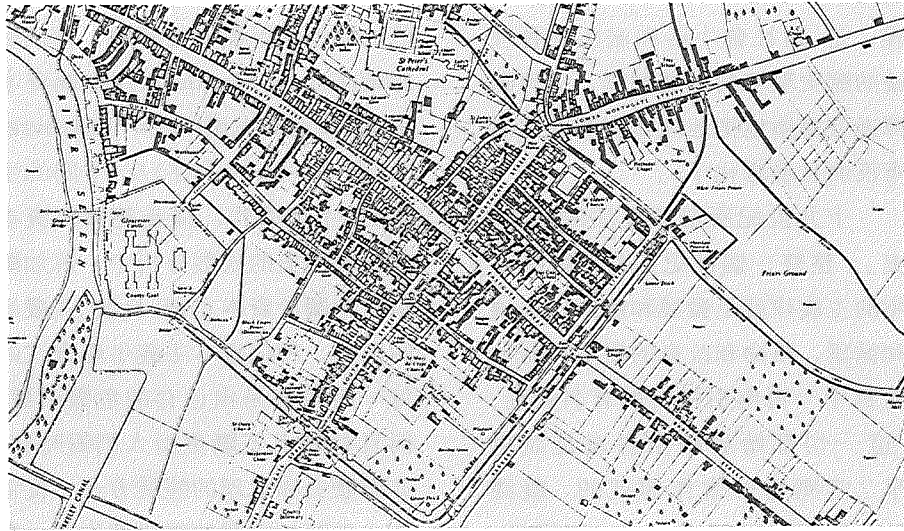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226 pages.

## 歷史能否聯結？

如果說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歷史的零碎化和多層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對所有歷史敘述中所包含的虛構成分和意識形態矛盾的不妥協的發掘和解構，那麼這樣一種新的歷史觀和歷史敘述方式也許正依循了一個並時性、空間化的思維原則，竭力擯棄的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描述的「同質而且空洞的時間流」，轉而確認歷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差異、斷裂和無序。

這種空間化歷史重構，無疑會進一步釋放出歷史經驗的複雜性和偶發性，在打破任何企望凌駕一切、統帥一切的元敘述的同時，凸現出被掩蓋、被遺忘和被壓抑的分敘述或微觀歷史。然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的歷史寫作實踐面臨着困難的意識形態選



擇和政治取向。簡而言之，一個反覆出現的理論問題便是：在多大程度上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敘述願意承認有一個最終把諸種微觀歷史整合起來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亦即各個零散的歷史敘述之間有沒有聯結點，人類歷史是否不再是一個有意義可尋、可以理性化的整體？問題的核心也就是後現代的歷史觀會不會徹底取消掉人，作為歷史的承受者，對歷史有意識的滲入和改變？

執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地理學家和哲學家蘇加(E.W. Soja)的論文集《後現代地理研究：批判性社會理論中對空間的再肯定》，正是想從「後現代左派」的立場，來正面回答這樣一個挑戰。該書的出版，是蘇加最近十年來地理研究和思想的集大成，完整體現了作者的「唯物主義地理觀」。

## 走出現代

蘇加倡導的「批判性人文地理學」(Critical Human Geography)實

際上是關於人對空間的歷史經驗的描述，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組織和製造生產的空間關係的批判研究；而他所嘗試的「後現代地理研究」，不僅集中反映出當代哲學，尤其是左派傳統，對空間概念的重新思索，而且也包含着對「現代性」這個概念的檢討和豐富。在蘇加的理論架構裏，「現代」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和意識形態系統，其突出的思想淵源便是「唯歷史論」(Historicism)。無論是正統的、為現代的到來而辯護的哲學闡述(如黑格爾)，還是持批判態度的社會理論(如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其根本的預設便是歷史的時間屬性，其想像和邏輯都是線性的、發展型的。十九世紀中葉發展起來的批判性社會理論之所以必須強調人類經驗的「時間性」而不是「空間性」，是因為人們在這種歷史想像和投射中看到「創造歷史」的可能和必然。隨後興盛起來的對「實踐」和「行動」的強調(葛蘭西曾簡稱馬克思主義為「實踐哲學」)，也正是基於一種對未來的烏托邦式信念。唯

十九世紀中葉發展起來的批判性社會理論之所以必須強調人類經驗的「時間性」而不是「空間性」，是因為人們在這種歷史想像和投射中看到「創造歷史」的可能和必然。

對時間或者歷史的鍾情，構成了「現代」及其哲學思辯的特徵，而超越這種「唯歷史論」，重新肯定空間在人類經驗中的關鍵地位，是蘇加全部努力的起點和歸結。

與資本主義的生存密不可分的是不斷生產製造出來而且迅速被神秘化的社會空間。這個新的空間不但體現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且同時保證這種關係的再生產。

歷史論的思想傳統，按照蘇加的定義，是「對社會生活和滋生社會理論的歷史環境的過度闡釋，這種闡釋過分積極地把地理或空間性想像淹沒而且邊緣化了。」

十九世紀所全神貫注的是「歷史」：整整一個世紀，縱貫歐洲大陸的主旋律就是發展和停滯，危機和循環，革命和改良的變奏。蘇加在書中一再申引福柯的著名質疑：「這一切都始於柏格森還是說更早？空間總被當作僵死的、凝滯的、無辯證法可言、一成不變的；而時間卻是揉雜的、豐饒的、充滿生命、而且富於辯證法的。」正是這種對時間或者歷史的鍾情，構成了「現代」及其哲學思辯的特徵，而超越這種「唯歷史論」，重新肯定空間在人類經驗中的關鍵地位，是蘇加全部努力的起點和歸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蘇加接受「後現代」的提法，要在走出歷史的陰影的同時，走出現代，完成對「現代」這一歷史階段的總結批判。

## 空間性闡釋與資本主義

「後現代地理研究」想引進的實際上是一套新的論述模式和思維邏輯。對歷史經驗的「空間性闡釋」不僅僅暴露出傳統社會理論的烏托邦色彩，和以歐洲為中心的論述前提，而且也揭示出現代資本主義生存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即通過不斷地重新結構和空間調整來確保其合法性和再生力。蘇加要檢查的，便正是和「創造歷史」同步發生的「創造地理」。

除福柯的深刻影響之外，賦予蘇加的理论以極大靈感的，當推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晚期資本主義》和雷菲夫爾(Henri Lefebvre)的《資本主義的生存》及《空間的生產》等主要著作。從曼德爾對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宏觀分析中，蘇加繼承了他關於資本主義「長波」式發展的模式，相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每一階段都是由已存的危機引發，而且整體上不斷更新人們對時空、亦即歷史和地理的經驗方式：從雷菲夫爾關於空間的經典著作裏，蘇加接受了他的一個核心論點：與資本主義的生存密不可分的是不斷生產製造出來而且迅速被神秘化的社會空間。這個新的空間不但體現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而且同時保證這種關係的再生產。雷菲夫爾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現其有能力弱化(甚至解決)其內在矛盾，其結果，便是在《資本論》成書後的一百多年裏，資本仍在不斷地「增長」。我們無法估算這一增長所需要的代價，但我們卻知道其方式：那就是不斷佔據空間，生產空間。」(《資本主義的生存》)新空間的開闢和生產同時也就不斷地制約規範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方式。正是在雷菲夫爾那裏，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唯工人觀」(Ouvrièrisme)——即狹窄的只注意工廠裏的剝削和鬥爭的分析方法——受到揚棄，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作為一個分析批判對象被肯定了。

在這個基礎上，蘇加明確地將「空間性」或「空間關係」定義為「作為社會產品的對空間的組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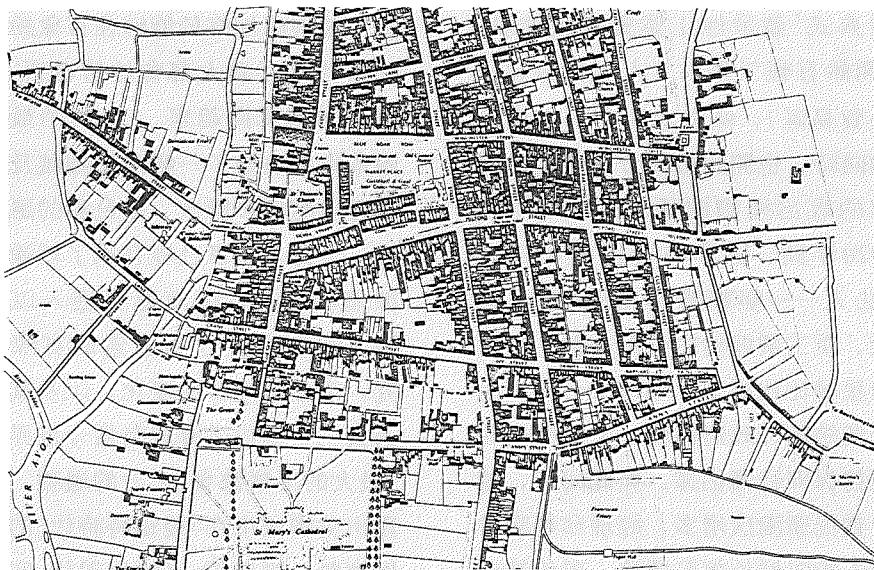
就是「社會—空間辯證法」。空間由此獲得完全的社會屬性，其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中的作用得到確認，不再是「僵死、凝滯的」自然對象物。確立了「社會—空間辯證法」的正當性之後，蘇加進一步檢討了傳統的社會理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空間問題的忽略（最關鍵的原因仍和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有關），而且也介紹討論了一系列當代左翼理論家的貢獻，例如哈維(David Harvey)，卡斯德爾(Manuel Castells)，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關於後者，蘇加專闢一章進行討論，特別是吸取了他對「樞紐化」空間關係的理論分析。這批作家的主要著作都出現在80年代，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地理學の後現代化」。其主要標誌，就是「城市問題」的重新出現，和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空間的不斷調整變化的理論探討。而早在70年代，就有「資本主義必須維持地域之間不平衡發展」的命題，有關於「中心區和邊緣地帶」的爭論，有「地域間不平

等交換」或「價值的地理轉移」的理論模式。

## 現代資本主義的區域變遷

總的來說，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全球性系統，作為對全球空間的界定和劃分，從70年代開始被當作一個關係到資本主義的性質及生存的重要問題正面提了出來，同時也奠定了「批判性人文地理學」的基礎和領域。在這樣一系列對社會—空間系統進行重新研究的努力中，蘇加認為，仍然明顯地有着傳統理論的「整體化」的趨勢，因而沒有完全把握空間問題的複雜性。社會—空間辯證法中最關鍵、最縱深的一環，就是縷清「各種剝削關係組成的、多梯狀的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網不僅涵蓋着全球空間，也涵蓋着任何局部空間：不僅牢籠了全球體系，也牢籠了每一個具體的工廠和家庭。這一論斷似乎構成蘇加「後現代地理研究」的基本前提。

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全球性系統，作為對全球空間的界定和劃分，從70年代開始被當作一個關係到資本主義的性質及生存的重要問題正面提了出來，同時也奠定了「批判性人文地理學」的基礎和領域。



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可以根據歷史地理中區域化的不同形式來分期斷代。從一國之內的地區差別，到世界範圍的殖民劃分，以及內部的城市建設和空間關係的樞紐化，構成了一部現代資本主義的區域變遷史。

洛杉磯地區的變化，以及其在過去三十年內一躍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工業都會」之一的過程，體現出美國城市在「後福特時代」的發展趨勢，標誌着一個「後現代」空間的浮現。

儘管蘇加一再強調要擺脫「歷史想像」的陰影，強調並時的空間關係對於人們日常生活的滲透，但在他正面展示他的「後現代地理研究」之前，仍然發現有必要重新追溯一番「城市和區域範圍重新結構過程的歷史地理」。在這一章裏，作者依據曼德爾的學說提供了一個關於區域空間的發展和重新結構的歷史敘述。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可以根據歷史地理中區域化的不同形式來分期斷代。從十九世紀上半葉一國之內的地區差別（例如美國的南部，意大利的中部），到下半個世紀世界範圍的殖民劃分，以及與此同時發生的內部的城市建設和空間關係的樞紐化，構成了一部現代資本主義的區域變遷史。而到了本世紀70年代，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了自己的空間規劃和區域化的發展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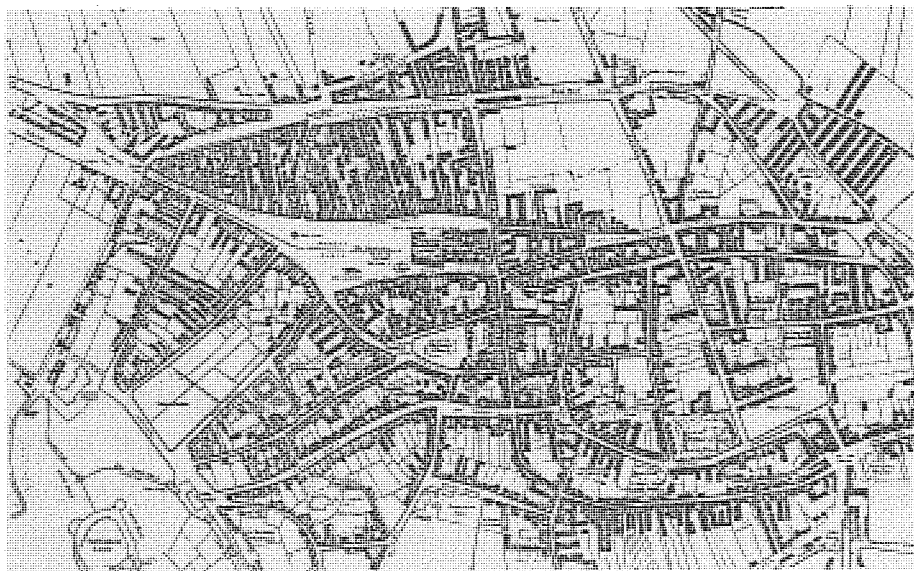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蘇加以一個抽象化的美國城市重新結構的歷史，來說明都市空間的變化擴展。從1840年以前以手工工作坊和商埠構成的「經商城」，到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經典式「競爭性工業資本主義城」（開始有輕工業，工人居住區和中心貿易區），城市空間在不斷擴大的同時，也開始被劃分，界定出明確的政治經濟關係。從1870年到1920年間，標準的美國城市進入「法人——壟斷資本主義城市」階段，重工業開始向外圍疏散，工業衛星城比比湧現，城市中心逐漸由企業總部、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和服務保安行業佔據。與此同時，隨着貧民窟漸次增多，經理和專職階層先後向城外郊區遷移，現代都市

的風景線進一步伸延，在形成無數小的散點的同時，改變了社會政治勢力的佈局和組成，首先便是產業工人及其工會終於失去了有效抗爭的力量。

美國城市的另一重要蛻變發生在20年代末的大蕭條之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經營的都市體系」。原來的內城進一步被遺棄、貧民化的同時，政府也開始「收復」市中心。更主要的是，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騰飛——集中表現在汽車、航空、石油、及耐用產品工業的高速發展——更加確立鞏固了政府的調節干涉性能。郊區化的深入和高速公路的大規模興建及標準化，組成了一個極廣泛的網絡狀空間控制系統。而這個新的「社會—空間」現實，或稱以汽車為象徵的「福特時代」，自然又醞釀着新的重建和演變。

## 洛杉磯：後現代空間的浮現

正是這樣一個「歷史地理」的勾畫，使得蘇加終於能够在百象紛呈的當代洛杉磯大都會地帶看到「所有一切都聚攏起來」。全書的最後兩章集中描繪了一幅洛杉磯城及其鄰近地區的多層次、多色彩的風景圖。至此，作者已經完成了理論的準備和闡述，從而返身進入以數據、圖表和敘述為線索的實際研究。洛杉磯地區的變化，以及其在過去三十年內一躍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工業都會」之一的過程，體現出美國城市在「後福特時代」的發展趨勢，標誌着一個「後現代」空間



的浮現。

60年代以後，隨着太平洋圈的日益突出，洛杉磯地區出現了幾大變化。首先是由重工業、製造業向高科技工業的轉移(軍事、航天、電子)，不僅改變了就業人口的組成，也加劇了舊工業中心和新白領階層居住區之間的溝痕。由此出現的新的就業和居住中心(在洛杉磯機場以南地區居住着美國最大的工程師群，服務於當地的航天及軍事工業)，使得洛杉磯本城不斷擴伸，也帶來了星羅棋佈的衛星城。此外，隨着外國資本的湧入，重工業的外移，及第三世界人口的移民(尤其是婦女)，造成了洛杉磯地區奇特的「中心被邊緣化」的現象：一方面是洛杉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另一方面，則是一些低技術工業(如服裝、玩具)的重新出現。第三世界移民的工作坊，其工作條件惡劣之至，足以使人想起恩格斯筆下十九世紀的勞作場。少數人種和移民工人提供了廉價而且順服的勞動力，不但在國內市場富有競爭力而

且也能和新興的第三世界工業化國家競爭(洛杉磯地區的小工廠生產的一些汽車配件或服裝常常會瞞天過海地打上一個made in Brazil或made in Hong Kong的印記)。

把洛杉磯的層層複雜面攤開來以後，蘇加終於決定檢驗他的「後現代地理學」。在全書的最後一章，他試圖把巨大的洛杉磯拆散開來，平面地展開，以便揭示所有並存的、共時發生的矛盾衝突。作者此時充分意識到語言描述的欠缺。整章的敘述便追蹤着作者在洛杉磯市中心和外圍的來回移動，是「一系列片斷的觀察，是一些反思兼解釋的手記的自由聯結，其目的是建構一個關於洛杉磯都市地區的批判性人文地理學。」

正是在這一章裏，我們可以更明確地看到福柯思想對作者的影響，特別是從後者對作為樞紐點的市中心的分析中，可以追溯到福柯對現代社會空間的分析。正因為有了這樣一個樞紐點，有了一個界定性的中心，四周的空間才獲得社會

正因為有一個樞紐點，有一個界定性的中心，四周的空間才獲得社會意義，邊緣地帶的都市建設才成為可能。

「後現代左派」面臨的一個理論的烏托邦色彩，在二十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裏，還有沒有可能在這個體系之外進行社會批判？

後現代地理研究是對二十世紀的生存狀況的批判性反思同時，也記錄下一個世紀的深刻焦慮和世紀末的蒼茫。

意義，邊緣地帶的都市建設才成為可能。而在洛杉磯，在後現代的空間領域裏，作者認為，這樣一個以樞紐點為核心的重建過程恰恰又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因為正是這樣一個中心被有意無意淡化、飾蓋，甚至裝潢上一層向所有公眾敞開的外表，但事實上這個中心不但沒有消失，而且不斷更新加強。

儘管蘇加馬上謹慎地指出確認這樣一個中心並不等於回歸到傳統的決定論，但在對市中心的討論中，仍然流露出想指出權力和控制的出發點的慾望。後現代地理研究，如果要保持任何批判意義的話，似乎不得不對準這樣一個樞紐點：在承認了所有的層次、變幻和斷裂之後，「批判性人文地理學」似乎不得不強調貫穿空間關係的始終是意識形態抗爭和政治經濟權力角逐。這樣一個雙重論證在很大程度上也許恰好扣住了「後現代左派」面臨的一個理論的烏托邦色彩，在二十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裏，還有沒有可能在這個體系之外進行社會批判？如果批判性社會理論最終要求一個把一切都聚攏起來的總體聯結——無論是「歷史」還是「地理」，而後現代的時空經驗難道不正是反覆地宣佈這樣一個最終聯結已日益縹緲，至少也是無窮地推遲了嗎？

### 主體的消隱

透過後現代地理學，我們終於看到一個無情的事實：在後現代龐然陌生的風景線上，消失了的正是人，正是能够批判、能够主動改變

空間的主體，取而代之的是被無邊的建築群、高速公路、購物中心和各種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制約所規範的無聲無息、繁忙奔波的人群。後現代地理研究所展現的正是這樣一幅圖景。在蘇加所描繪的無聲的對象和作者所採取的批判姿態之間，有着明顯的不協和。雖然作者要進行「批判性人文地理」的研究，但除了空間被等同於冷漠的規範性社會現實之外，「人」或者「地理的創造者」並沒有獲得任何的認可：恰恰相反，「社會—空間辯證法」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洛杉磯面前，忽然變得蒼白無力，除了再一次稱羨聞名遐邇的Bonaventure大旅店，竟別無他能。

蘇加一直強調「創造地理」，甚至提出「空間化的本體論」（論及雷菲夫爾、海德格爾和沙特），但極完善的理論，仍無法不讓「人」——作為歷史和地理的承受者，消失在煙霧瀰漫的後現代都市地平線裏。當然，同時消失的也是「後現代地理研究」所承諾的諸多可能，以及這地平線之外的全球空間。後現代地理研究是對二十世紀的生存狀況的批判性反思同時，也記錄下一個世紀的深刻焦慮和世紀末的蒼茫。

唐小兵 198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英語系，1991年獲美國杜克(Duke)大學文學博士。譯有《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論文散見於大陸、台灣、香港和美國。現任教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